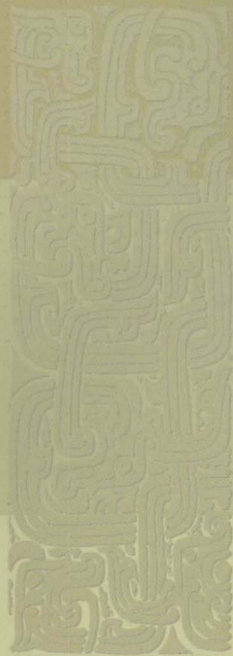


中西哲学之会通 十四讲

牟宗三 著
罗义俊 编

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西方哲学所关心的重点是“自然”。重点在生命，并不是说对自然没有观念、不了解，重点在自然，也不是说不知道生命，只是历史开端时重点有些小差异，就造成后来整个系统发展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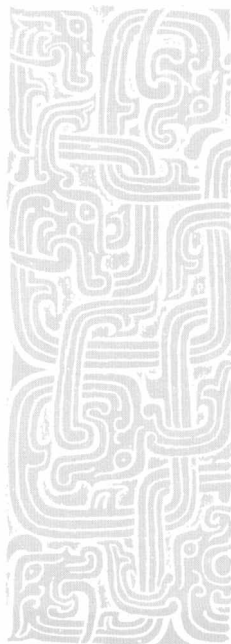
中国人几千年学问的精华就集中在性理、玄理、空理，性理讲道德，玄理讲自在，空理讲解脱，都是为维护润泽生命的，是生命的学问，西方哲学重知识的传统，重实证，重逻辑，重科学，它开出近代的科学、政治、社会、经济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不足，如何从生命之智向实存之知，如何会通两者，正是中西哲学会通的课题。



(牟
宗
三
学
术
论
著
集)

中西哲学之会通 十四讲

牟宗三 著
罗义俊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牟宗三著. 罗义俊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7

(牟宗三学术论著集)

ISBN 978-7-5325-4699-2

I. 中… II. ①牟…②罗… III. ①哲学史—研究—
中国②哲学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B2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4996 号

本书由台湾学生书局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 罗 颖

装帧设计 红 斌

顾 顾

牟宗三学术论著集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牟宗三 著

罗义俊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8.375 插页 3 字数 195,000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978-7-5325-4699-2

B·606 定价: 21.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前言

牟宗三先生(1909—1995),字离中,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1909年6月12日(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山东栖霞牟家疃。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山东寿张县乡村师范、广州学海书院、山东邹平村治学院、广西梧州中学、南宁中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并主编《再生》、创办《历史与文化》、编辑《理想历史文化》杂志;1949年后,历任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新亚研究所哲学组导师,受聘讲学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中兴大学等校,后任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中央大学”荣誉讲座教授,讲授逻辑、知识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与文化。1995年4月12日,逝于台北。

牟宗三先生以“反省中国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为一生职志。初从张申府先生习罗素、维特根斯坦、怀特海哲学,后长期追随当代新儒学开山熊十力先生,与唐君毅、徐复观同为熊氏在港台的三大弟子。熊氏曾说:“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可为可造。”牟先生一生讲学不倦,著述不已,传世的著述译作三十种。其中有:哲学讲座《中国哲学的特质》(1963年6月初版,以下仅注明初版年月;省“初版”二字)、《中国哲学十九讲》(1983年10月)、《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1990年3月),以及牟先生去世后刊行的《人文讲习录》(1996年2月)(还有尚未刊行的《四因说演讲录》),由此可统窥牟先生学问的范围、大纲

2·牟宗三学术论著集·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节目、脉络指向、文化意愿及精神意态。《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1935年5月)、《历史哲学》(1955年夏)、《名家与荀子》(1979年3月)、《才性与玄理》(1963年9月)、《佛性与般若》(1977年6月)、《心体与性体》(三大册,1968年5月、10月,1969年6月)、《从陆象山到刘蕺山》(1979年8月),为一整套的中国哲学史论。其中《历史哲学》又与《道德的理想主义》(1959年11月)、《政道与治道》(1961年2月)并称为三新外王学(历史社会政治哲学)名著。译注康德哲学的三大批判:《康德的道德哲学》(1982年9月)、《康德纯理性之批判》(上下册,1983年3月、7月)、《康德判断力之批判》(上下册,1992年10月、1993年2月)。《逻辑典范》(1941年9月)、《理则学》(1955年11月)、《认识心之批判》(1956年9月),以及译注维特根斯坦《名理论》(1987年8月),乃为其逻辑学、认识论著作。《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1974年3月)、《现象与物自身》(1974年8月)、《圆善论》(1985年8月),则表示牟学思想体系的完成。此外还有《生命的学问》(1970年9月)、《五十自述》(1989年1月)、《时代与感受》(1984年3月)等。

牟宗三哲学是中国传统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发展,“第三期儒学”的概念即首先由牟先生所提出。牟先生是当代新儒学主要的、影响卓著的代表人物。他的先后期门生弟子大多是港、台地区哲学界、新生代的杰出学者,影响遍及北美、英、欧、日、韩、新、澳洲等地。《中国哲学的特质》和《中国哲学十九讲》七八十年代已有韩文版行世;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Joël Thoraval 博士现正拟将前书译成法文印行。1987年香港大学特颁牟先生荣誉文学博士仪式上,哲学系教授 F·C·Moore 博士特致辞说牟先生由儒家的心性学为起点所建立的“道德形上学”,为一超越义的形上学系统提供一道德的证明,是一勇

敢而有原创性的思想线索,有深远的成果。同年冬季学期起,德国波昂大学专设“牟宗三哲学”课程,由哲学系教授J·Simon 博士与汉学系教授R. Traunzettel 博士共同主讲。《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也设“牟宗三”条目。牟先生生前名字又进入1995年出版的《英文剑桥哲学字典》索引,其中“中国哲学”的总条目中指出“牟先生是当代新儒一派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为满足学术界的需求,提供一种学术资料,经上海社科院罗义俊先生积极联系推荐,征得牟宗三先生夫人赵惠元女士及牟公子元一先生追认同意并全权授权,由本社印行牟先生部分著作的简体字本,并同意个别地方稍作技术性处理。此外,由印刷故,原书个别的错讹字,径改而不标明标校之符号;《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则依牟先生生前所作的标校,亦径改。本社现在的印行次第,并没有遵循牟先生著作原来发刊的时序,是经过相应策划后的编排。书末附录的牟先生相关的五篇文章,特为这次出版而约请罗义俊先生编纂而定,牟先生相关的文字还有很多,惟因缘不具,未能与广大读者共享。至于由罗义俊研究员撰写的读书笔记,作为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

序

此讲辞是十年前在台大继《中国哲学十九讲》后而续讲者。《十九讲》早已出版，而此讲辞则因当时诸研究生俱已出国深造，无人由录音带笔录为文，遂成蹉跎。后由林清臣同学独自担任笔录，联贯整理，共十四讲，先发表于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后复转载于《鹅湖》杂志。

清臣是台大老同学。原读化工系，后学医，专精脑神经科，现在日本研究老人科。彼一生副习哲学，从未间断。三十年前，吾之《认识心之批判》由友联出版时，唯清臣读之甚精。后凡吾在台大、师大所讲者，彼率皆由录音听习。彼之笔录此十四讲并非易事。平素若不熟练于西方哲学之思路与辞语，则甚难著笔从事。故其录成文字，功莫大焉。盖吾课堂之讲说并无底稿。若不录成篇章，则纵有录音，亦终将如清风之过耳，一瞬即逝，无由得以留传人间，广布社会，此岂非大为可惜之事乎？

又彼笔录之时，每成一讲，必由其夫人正楷誊写寄吾改正，改正后，复由其夫人再誊清一过，然后始交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发表。如此慎重将事，当今之世，何可多得！值兹付印之时，略发数语以识其贤伉俪好学之真诚。时在一九九〇年三月也。

牟宗三
序于九龙

分判与会通

——读牟宗三先生《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罗义俊

一、牟学导读 西学门径

1974年,牟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此后以哲学导师镇守新亚研究所,并讲学于港台之间。随着他的影响愈来愈大,讲演日多。《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乃其中的一系列讲座辞,于1982年11月起,应台湾大学与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的联合邀请,讲于台大哲学研究所。讲辞由追随弟子林清臣医师录音整理,经牟先生改定成文。先是于1985年7月,逐期刊于台中东海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化月刊》上,后《鹅湖》月刊相继连载。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3月初版。

本讲辞,讲于牟先生学思圆熟之时,十分重要。牟先生毕生并治中西哲学。早年于西方哲学用力甚勤,如怀德海、罗素、莱布尼兹、杜威等,赴台前,都已有相关的论文发表,又刊有《理解理性与理念》一书(江西铅山鹅湖书院1946年印行)。旅居台、

2·牟宗三学术论著集·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港后,有弟子谓牟先生用七成时间于中国哲学,三成时间于西洋哲学(王煜《读蒋松〈一代哲学宗师唐君毅〉兼怀牟宗三》,香港《毅圃》1996年12月第8期)。举凡从古希腊哲学到西方近现代哲学,牟先生皆有论涉与深见,无不具专业水平。而与中国哲学相会通,则是其哲学工作旨趣之一,牟宗三哲学思想体系正是其会通中西哲学的硕果。当牟先生讲演之时,非但从《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到《心体与性体》的中国哲学史总论,及《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等消化西哲的译注已完成;即《认识心之批判》、《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亦已印行,此三种书都是直接表述其哲学思想的。《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简明精要,将此之前对中西哲学的两步消化合笼在一起,按其会通的指向,结晶式地反映出来。至于讲知性,讲智的直觉,讲物自身概念,其所表述的,更直接来自《认识心之批判》等三书。两步消化的重点,在本讲,其表现在西方哲学。《十四讲》实可视为牟先生消化西方哲学之一结晶,它直接阐述了牟先生对中西哲学的会通理路,是牟先生治西方哲学史的简明读本,是牟学之一导读,若与其前发表的《中国哲学十九讲》合观,则牟先生一心开二门——德性知性具足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更能了明了。

当《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先刊于《中国文化月刊》时,适上海图书馆港台阅览室八十年代起逐期订购,故笔者读牟先生书读了十多年,惟此书及时读到。此后,三读未厌。此书虽思路深邃,概念密集,却面目清楚,间架朗然,文字爽快,加之论述精辟,所蕴含之意义层出不穷,读之收获良多。它不仅给你西方哲学史的知识,还给你哲学思考与解读西哲的理性方法。故仅知性地看,说它是治西方哲学史之一门径,是绝不为过的。

二、给会通一个哲学说明

中西哲学之会通,是个大题目。讲这个题目,当然不能离开中西哲学的史实,但其性质则是哲学的。中西哲学各具形态与特质,这一点,在今天已是学界之共识。但不同形态与特质的 A、B 两项之会通,如何可能?这是劈头就碰到的问题,由此即可见中西哲学会通之“会通”的问题性。也就是说,中西哲学之会通,其根据,必须从理上给予解答或说明。这是“会通”之能成立(合法)与否必不可少的。当然,会通以后 A、B 两项是否还存在,或只剩下 A 或 B 单项,或变成新的单项?而使结果只剩下单项或新单项,是否还能称会通,或者乃是所谓“创造性转化”一类?尽管这可以一路追问下去,但凡此均可由“会通”的问题性牵带出来。而且,无论怎么说,作为中西哲学之会通,首先要处理的,仍是此“会通”的可能性问题。这一步清楚了,就可能步步清楚。牟先生说,哲学就是要使人头脑清楚。

抗战胜利后,贺麟著《当代中国哲学》(上海胜利出版社,1945年11月),其中第二章为“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绍述当然不是会通,融会的意义则与会通相近。贺书乃哲学史著作。按贺书,可知中西哲学之会通,其实际工作,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开始,惟当时尚未将“会通”本身视为一哲学问题明确提出,而正面说明其可能性。至于当今一批美国华裔学者如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12月),以及江日新主编、成中英等著《中西哲学的会面与对话》(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2月),其所作的努力,即使我们都把它们划入“会通”的范围内,也同样未曾对“会通”作过正面的哲学论证。牟宗三先生正视此中

西哲学会通之“会通”的问题性,且给出一正面的、适当而朗然的哲学说明。《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开宗明义第一讲所处理的问题,就是:“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然后,在此哲学说明所展示的理境中,对中西哲学史实,依理作纲领性的会通。它对中西哲学之会通,第一次提供了哲学意义的处理,是会通中西哲学的元典性的理论文献。

全书的处理方式是以虚控实的,也就是分虚、实两个层次。所谓虚,即将“会通”视为一哲学问题,从理上加以说明,这是第一步。所谓实,即依理处理中西哲学会通之事,这是第二步,这一步是具体的,是实。这两步都不能缺。若缺乏理上的说明,只是就事论事地说,则所谓会通,就会懵懂不明,游荡不定,完全可能变成见仁见智的主观意见。将中西哲学之会通置于适当(合法、应当)的会通之理境中“辩而示之”,始能获得客观性而朗然确定下来。反过来,若不能就事上“辩而示之”,则理境恐将流于空造,不能落实,也可以说只开花不结果。但这里,理是“辩而示之”的根据、规范与轨道。所以第二步是第一步的具体运用,也是第一步的逻辑结果。在牟先生,这两步相合,理事无碍,开花结果,成一完整的“会通”。

依牟先生的说明,讲中西哲学之会通这个题目,有两重性格,一是通学术性,一是通时代性。这就是既要从学术上,也要从时代上说明道理。

通学术性,这好理解。但为什么还要通时代性?通时代性,也就是关连着时代讲。这是强调中西哲学会通工作的必要性,指明其时代意义与文化意义。因为这个时代发生了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是个价值与方向问题,故并不是科技性的,说到底是哲学性的。牟先生指出,时代问题归到核心即是哲学问题。各归其位建立自身的存在价值,现代化的本质意义之理解,世界分裂,这

些文化建设与文化问题,最后就是真理标准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而哲学关连着文化讲,乃是指导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与智慧,讲中西哲学之会通就是从核心处讲中西文化之会通。这个题目有两种讲法,一是存在的,一是非存在的。纯理智游戏当然是非存在的,它拒绝关连着时代,至少是不自觉不主动去关连着时代,结果成了理智一层论,而道理自然也说不通透。关连着时代讲,则是自觉地、主动地,也是存在地承担时代问题与文化责任。显然,牟先生乃视中西哲学之会通为一对治时代问题的文化核心工作,故说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奋斗方向。依牟先生之见,对中西哲学之会通的道理,人类若能看明白,就能使生命通透,认明方向,具备解消这个世界价值标准、真理标准歧分的智慧,而互相沟通。通时代性,赋予了中西哲学之会通这个大题目的存在性格与“人文化成”的文化品格。

如果说关连着时代讲,为中西哲学之会通说明与规范了价值方向,那末通学术性则是收缩在中西哲学之会通本身,直接进入其可能性问题的处理。牟先生说:“通学术性就要了解中国哲学及其传统、西方哲学及其传统,而中西哲学能不能会通,会通的根据在哪里?会通的限度在哪里?这就是所谓的通学术性。”此学术性的展开,就是本节前面所述的,牟先生理事无碍的两步工作。

中西哲学会通的根据何在?一言之,就在哲学真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于此,牟先生在本讲中,有一系列明确的概念说明。这些说明会通问题的概念,如个体性原则、内容真理等,其本身还可展现出很多哲学意义,这里无暇论究,只能围绕着会通的主题,大体地看看牟先生的说明。牟先生的说明分两层,一层在说明普遍性与会通的关系,一层在说明特殊性与会通的关系。牟先生认为,哲学有其普遍性,盖哲学在追求普遍的真理,所讲的道理都有普遍性。由

普遍性始可以言会通,若无普遍性就不能会通。

哲学真理的普遍性是牟先生给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的直截了当说明,这一层,一经点明,即可理解,故牟先生会通理论的重点,其实是放在对特殊性与会通的关系的说明上。

这是为什么?因为会通不是笼统地说、凭空地说。牟先生说:“并不是笼统地什么问题都可以会通,有些是不相干的。会通能会通到什么程度?这其中还有限度的问题。”而由特殊性即能明会通的限度,扣紧了会通的限度去说明,始是具体地,而不是笼统地解答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成为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问题。所以牟先生说:“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深入了解。”而当初牟先生在台大哲研所的讲题,原就是“中西哲学会通的分际与限度”。有分际与限度,就有分判。分判与会通,贯通全书;其实也贯串牟宗三哲学。

三、会通中有分判;分判是会通的基础

特殊性与会通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要转一个弯,要在会通的分际与限度上转一个弯去理解与说明。这就是说,会通是有分际的,有限度的,或者说是有分际与限度的规定的。牟先生说由特殊性可以言限制,是说会通中的限制,这也就是说特殊性对会通是一种限制性的关系。倒过来,也可说会通之有限度,其根据即在特殊性。

而且,会通也不是同类项合并,不是将会通的A与B两项都拉掉,或抹杀一方、化掉一方。于此,牟先生说得很明白,虽然可以沟通会通,也不能只成为一个哲学。可以会通,但可保持其本来的特性,中国哲学保持其本来的特色,西方哲学也同样保持其本来的

特色,而不是互相变成一样。这里同样是一个会通的分际与限度的问题。

这个转弯的理解与说明,这个有分际与限度的会通,这个不是承认一方抹杀另一方的会通,均须分判;事实上在本讲的展开中,从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上说,是会通不离分判;会通中有分判,分判是会通的基础。

依本讲,会通双方都不能抹杀,是从普遍性与特殊性都要同时保存上去说明的。而特殊性与会通的关系,说到底则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这在牟先生,是通过分判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抽象的普遍性与具体的普遍性、外延真理与内容真理等的界限,一步一步来加以说明的。

牟先生认为,哲学有其普遍性,但也有其特殊性。这两者都不能抹杀,不是只有普遍性,也不是只有特殊性。由于有特殊性,故有中国的哲学,也有西方的哲学。普遍性由观念、概念来了解,特殊性是由生命来讲,因普遍性的观念、普遍的真理是要通过特殊的生命来表现的。盖哲学真理与科学真理性质不同,其不同就不同在前者系属于主体,后者不系属于主体即不要通过特殊的个体生命来表现。故科学是无国界、无颜色,无所谓中国的科学、西方的科学,只有一个科学。牟先生借用罗素的逻辑名词,将不要通过特殊生命来表现的真理,名之曰外延真理。外延真理可以量化与客观化,故能客观地被肯断。系属于主体的真理,牟先生名之为内容真理。哲学的真理都是内容真理,因其系属于主体,而不能客观地被肯断。哲学真理既然要通过特殊的生命来表现,同时也就为表现真理的生命所限制。“这就是普遍性在特殊性的限制中体现或表现出来”。

这里,特殊性与普遍性是一体共存的,特殊性表现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这就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在特殊性的限

制中体现或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牟先生名之为具体的普遍性。这个特殊性是不能拉掉的,它与罗素的说明的知识与怀德海坚持的原子性原则,以及英美社会政治重视的个体性原则同样有其存在的意义。拉掉了特殊性的普遍性,牟先生名之曰抽象的普遍性,与具体的普遍性相对。依牟先生的说明,可知中西哲学的会通,不能寡头地只讲普遍性,而拉掉特殊性对会通的限制。由普遍性讲会通,由特殊性讲限制,这是不可分割的,必须同时讲。拉掉或抹杀了特殊性的限制,其所谓“会通”(或者是其他什么“批判”、“转化”)云云,其实只能是一个拉掉与拉平,拉掉个体性、差别性,拉平成一个抽象的普遍性。这非但在哲学上失掉了根据,若用在社会政治上也就是立理限事以至以理杀人。为什么牟先生一再强调内容真理与外延真理两种真理都要承认,强调要重视个体性原则、原子性原则,反来复去说明特殊性的意义,这显然是一大缘故。在与抽象的普遍性的分判中,牟先生所创发的“具体的普遍性”一概念,显示出了它的深刻意义。具体的普遍性保存了特殊性、个体性、差别性,由此而可说“普遍性在特殊性的限制中体现或表现”,由普遍性言会通与由特殊性言限制可合在一起说。“故有普遍性也不失其特殊,有特殊性也不失其普遍性,由此可言中西哲学的会通,也可言多姿多采”。显然,也由此可见牟先生的会通论乃是会通中有分判,分判是会通的基础。

四、由分判走向会通

不能脱开分判言会通。牟先生认为,讲中西哲学之会通,首先应限制性地讲中西哲学之差异,不能离开限制性凭空笼统地讲普遍性的概念。在牟先生的实际处理中,大要有三步分判、两个眼光

或立场。中西哲学的分判为总体的一步,此步又以对中国哲学的内部与西方哲学的内部两步分判为学术基础。两个眼光或立场,一是现代的,一是会通的。此亦即通学术性与通时代性之具体的体现或表现。

依牟先生说明之理,由普遍性与特殊性两方面综合起来,就可把握中西哲学之主要纲领的差异。他认为,中西哲学的主要差异就在:中国哲学传统的领导观念是“生命”,西方哲学传统的领导观念是“自然”。这一步是由对中西双方各自的哲学与文化发展的了解、反省与分判而判明。

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自始着眼的重点即是生命,关心生命的妥当安排,要以理性来调护、润泽生命。这就是要使生命往上翻。儒、释、道无不如此。儒家讲性理,道家讲玄理,佛教讲空理,都是生命的学问。这是中国人几千年学问的精华,是中国文化内部核心处的智慧方向。但生命不只要往上翻,还有往外往下的牵连,顺此牵连而有各种具体而特殊的问题,如政治、社会、经济等等。所以,一个文化只有性理、玄理、空理,只有生命的学问是不够的,还应有逻辑、数学与科学,应有知识的学问,以适应处理具体而特殊的问题之需要。两者都要,不能互相取代。中国文化的缺陷在没有把逻辑、数学与科学发展到学问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心灵表现在知识的学问上,是消极的。而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精彩所出,同时又是现代中国人所努力追求的。但要能生根,我们的头脑、心态就须自觉地自我调整。这自然是要在文化基本核心处与西方文化相会通,也就是中西哲学会通的问题了。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反省,对儒释道的分判与会通,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已有集中、系统、详尽的讲录;本讲的重点在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与分判。

西方文化的精彩,即哲学智慧在其基本处。西方哲学五花八门,按哲学史教科书或常识,是一分为二的讲法,即实在论或唯实

论、经验主义传统,与理性论或唯名论、理性主义传统。牟先生着眼于现代,而另提出三个传统的划分。一是柏拉图的传统,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中世纪至圣多玛的神学,是古典的传统系统。一是莱布尼兹、罗素的传统。莱布尼兹是康德的传统。这三大传统或三大骨干的划分,还见于《中国哲学的特质》第一讲中,此讲也是着眼于西方现代哲学的特色与走向,可参阅。牟先生认为西方哲学的精华集中在此三大传统或骨干,由此可穷尽西方哲学。

将莱布尼兹至罗素视为西方哲学传统的主要骨干,并由莱布尼兹哲学思想的下委与上提而牵连到现代哲学的展开说明,由是提供了一了解西方哲学史的契入口、一个纲领、一把有现代眼光的钥匙,这是牟先生讲西方哲学史的一大特色。莱布尼兹本身不是经验主义与实在论者,而是近代笛卡儿以下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牟先生之所以把莱布尼兹单独提出来并下接罗素而成一个传统,其理由即是顺莱布尼兹逻辑分析的头脑往罗素那里发展而开出数理逻辑的系统,这在了解现代哲学上是非常重要的。现代英美的分析哲学之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牟先生认为就是由于有这两位大哲学家为其背后的支柱。由此传统,可见西方文化的精彩。

牟先生认为莱布尼兹、罗素传统既有概括性也有牵涉性。就莱布尼兹而言,其思想丰富而复杂,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具有关键性的人物,可以下委往罗素方面消融,也可以上提向康德方面消融。下委又有胜劣两义,胜义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劣义为消极的、破坏性的。依牟先生之见,顺着莱布尼兹的逻辑代数向下委顺延伸至罗素的数学原理,成就数学、逻辑,而成下委之胜义。这是西方文化的精彩。下委之劣义,是哲学方面牵连进英美经验主义与实在论以及逻辑实证论、语言分析乃至维特根斯坦,其所破坏的是形而上学的学问,当然,这并不妨碍英美经验主义与实在论的精神在社会